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全翔,龚志祥.顺应与制衡:武陵山区民族村落建筑文化中的自然策略——基于来凤县兴安村的田野调查[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2):44-51.

顺应与制衡:武陵山区民族村落建筑文化中的自然策略

——基于来凤县兴安村的田野调查

全翔¹ 龚志祥^{1,2}

(1.东北大学 民族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2.中共来凤县委党校,湖北 来凤 445700)

摘要:顺应与制衡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态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定向性自然策略。两种策略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并通过精神层面的内驱力作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顺应是人类历史演进之初用于感知自然环境所做出的负向性适应态度,具有适应性、被动性;而制衡则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用于改造自然环境所做出的正向性反馈态度,具有创造性、主动性。武陵山区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其先民自古以来传承着这种双向性的自然生态观念,并将其运用在民族村落的建筑文化之中,通过村落的宏观选址、微观营造以及场所仪式等方式呈现出来。地方性生态知识能够帮助我们用一种更加均衡的态度处理生态问题,这对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武陵山区;建筑营造;自然策略

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2-0044-08

一、顺应与制衡:中国传统自然策略的理论探究

从人类演进的历程来看,人类在长期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态情感策略,即顺应与制衡。这一对情感策略贯穿人类发展的整个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囿于当时的科学与技术能力,顺应式自然情感策略占领了社会文化层面,并通过生产活动、建筑营造以及生态仪式等具体形式表现出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并逐渐过渡到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于是积极式自然情感策略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人们通过这种具有主动性的自然情感策略——制衡,来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2006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中系统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三个阶段关系。从一开始,人类一味地向自然索取,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实现自我的发展,这个阶段主要采取积极的制衡方式,忽略了生态本身的脆弱性。后来,人类尝到破坏环境的恶果,重新审视自己对待生态的情感态度,这个阶段突出了顺应的重要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意识到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是共存的,保护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促进经济发展,逐渐调整对待生态环境的策略,这一阶段注重探究顺应与制衡的相互性,试图寻找解决生态与经济问题的措施和路径。^[1]

(一)正向性与负向性:两种自然策略的定向性分析

顺应与制衡是一对定向性的情感策略,具有不

收稿日期:2023-12-20

基金项目:河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领域研究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村寨文化特征与重塑研究”(202301)

第一作者简介:全翔(1999—),男,湖南衡南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文化研究。

通信作者:龚志祥(1966—),男,湖北来凤人,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策、民族文化研究,E-mail:enshilg@163.com。

同质的方向性。为了更好地理解“顺应”与“制衡”的概念与内涵,需要对“正向性”与“负向性”的概念进行界定。“正向性”与“负向性”,源于生物学界对植物刺激性的研究,后被引入到心理学、教育学以及人类学领域,其理论应用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生物学中对“正向性”与“负向性”是这样定义的:“植物对单向环境因素的刺激会发生定向运动,向刺激来源运动的现象为正向性,远离刺激来源的现象为负向性,两者根据向性运动方向而定。”^[2]教育学将这组概念用于阐述教育学中的隐性功能,正向性指代教育实践过程有助于系统化适应或顺应的贡献性功能,而负向性则是用于削弱这种适应或顺应的破坏性功能。^[3]生态人类学学者罗康隆从文化的视角阐述了适应与制衡的逻辑生态关系,并结合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重新建构了人类适应与制衡自然的历史过程、结构功能以及类型分析。^[4]而本文所指的“正向性”与“负向性”,是基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视角来阐述的,即假定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将其视为主观主体,而将相对于人而言的外界环境视为客体。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重新定义了“正向性”与“负向性”的概念,并将其用于分析村庄的建筑营造及其仪式。人们在应对自然的过程中采取的创造性、主动性的情感态度,我们称之为“正向性”;人们在应对自然的过程中采取的适应性、被动性的情感态度,我们称之为“负向性”。

从词源来看,“顺应”指的是顺着某种趋势去适应变化的环境而采取某种策略。《朱子语类》卷七十四记载:“‘物来顺应’者,简也。”^[5]其意为,选择“物来顺应”态度的人,能够做到一切从简,以此来应对生活中未知的风险和挑战,并且只会去顺应事物本身的变化,不会做出相对的违抗、反对的行为。这是人们为了应对变化的生态环境通过感知做出的负向性情感选择。一方面,顺应式情感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单向性负向策略,在遇到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情况时,原始族群会采取季节性迁徙、整体性搬迁等方式来减少自然环境对其生存的影响。另一方面,顺应式情感策略不仅是一种逃避性策略,还蕴含了主体对客体的顺应之势。长期生活在农耕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将其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整理成地方性知识,使其能够更好地依附于自然环境,以满足族群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制衡则是人类在应对和改造环境的同时通过反馈机制不断调节,从而维持生态稳定性的一种策略。

它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正向性抗衡情感。^[6]这种正向性在实践活动中表现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性,是技术进步和人们认知提高后的生存响应。人们了解、学习和掌握一系列的科学技术手段,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生活领域来实现对自然的正向性反馈。这种反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对自然的改造,如大规模的城市化与城镇化建设,改善自然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及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等,这些都是人对自然做出的技术性反馈;二是通过仪式呈现的方式来实现对自然的制约,如效仿自然的生存法则,找寻自然的运行规律,产生自然崇拜的互动仪式等,这些是人对自然做出的文化性反馈。制衡策略所表现出来的两种形式相互依存,一方面,人们通过生态知识、技术手段来改造自然不适于人类生存的一面,从而减少地形地势、气候条件带来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将对自然的敬畏以仪式符号形式编织起来,通过具体的仪式实践来签订与自然的“契约”,以换取村落的安宁和谐。

(二)两种自然策略的关系及建筑表现形式

顺应与制衡是一对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自然策略,二者有着辩证关系,表达了人们对待自然的定向性情感,通过精神层面的内驱力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两种策略在功能层面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表现为以近似的频率作用于人们的自然实践,并形成一致性的结果。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这两种策略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论。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总结—认识—再实践的方式探索自然生态的发展趋势,以求获取一套适应于族群生产生活的地方知识和经验积累,这是遵循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体现。另一方面,人类在遵循自然生态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地方知识和经验积累指导实践、改造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顺应侧重于遵循自然的方面,而制衡则侧重于改造自然的方面,两者共同构成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自然观念。两种自然策略在民族村落建筑文化的整体性保护和传承中显得尤为突出。从建筑文化的类型与结构来看,两种自然策略主要渗透于建筑环境选址、建筑营造结构以及建筑文化仪式等方面,并试图通过正向性与负向性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方面,顺应作为一种负向性的自然策略,通过依偎自然的方式,以识得性地方性知识来实现族群之间建筑空间的协调与统一。另一

方面,制衡作为一种正向性的自然策略,通过建筑空间形态来完成人们对待自然情感的象征性仪式表达,其中既包括人们对建筑营造过程中仪式文化的神圣性演绎,也包括人们将建筑空间作为仪式场所的世俗性转化,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制衡自然情感在建筑文化中的呈现形式。

武陵山区民族村落建筑文化的基因一直蕴含着顺应与制衡这一对自然策略的灵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典型性,体现了多民族地区对待自然的情感态度,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村落的对话,呈现为文化交融的形态。位于华中腹地的武陵山区,主要指武陵山及其余脉所处的区域,包括山脉、盆地以及丘陵等,是我国地势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该区域大致北以恩施与清江为界,东以沅水流域为界,西以乌江为界,南则以苗岭为界,贯穿湘鄂渝黔四个省市,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其生态环境具有复杂性。^[7]人们为了应对自然生态对族群生活的影响,一直秉持双向性的自然策略,创造出独特的生态文明,并将其运用于建筑空间。来凤县兴安村作为武陵山区的一个代表性村落,位于鄂湘渝三省交界,形成了民族性与乡土性的建筑形式,具有重要的艺术、科学和生态价值。本文运用顺应与制衡自然策略生态观,分析当地土家族民族村落选址、民居建造以及文化仪式的过程,通过系统性阐述,总结武陵山区民族村落建筑营造自然策略的特点与功能,在自然策略的基础之上,重新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相关的参考与建议。

二、顺应自然:来凤县兴安村建筑营造的适应之道

来凤县兴安村位于武陵山区余脉,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四周环山,村落依西北东南之势而建,沿上坡有序分布,因其分布特点,当地人称之为“兴安一面坡”^[8]。村民在村落选址、民居营造等方面采取了依偎自然的自然策略,一方面,通过对自然的地方性知识的掌握来理解和寻找适宜的村落选址,用以规避生态环境对于村落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地形地势、生态资源以及建筑工艺一般性知识的掌握来探寻正确的民居营造方式,以探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居环境。

(一)依附风水的村落选址

兴安村的村落格局遵循着中国古代风水学的四项原则,整体呈现出“背山环水”的特点,体现出人们

对自然环境的依附性。民族村落作为特定族群聚居形成的空间单元,其自然环境的选择决定了村落未来发展的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先民在建筑设计与营造过程中,总结了一套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论方法,即“风水”。它不仅决定着建筑外部环境的选择,也影响着建筑内部结构与功能的表达。“风水”一词,可溯源于东晋郭璞《葬书》,“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而散,界水则止,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大致含义为:安葬死者的地方需要蕴藏生气,而生气遇风则会消散,遇水则停留。要让生气汇聚而不散去,运动到此而静止,这就是风水的原理。随着风水术的普及,人们逐渐将其作为一种选择居住环境、构造建筑布局的理论方法,并贯穿于整个建筑勘测、选址与建造的过程。风水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融合了中国“阴阳两形”的哲学观念和民间传统文化中建筑、环境与生计的相关知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致中和”的内在逻辑。

传统的风水学讲究“藏风聚气”,基本符合“觅龙”“察砂”“观水”与“点穴”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套系统性的选址方法是人们在长期与自然的斗争中总结出的经验与知识的聚合,是人们规避自然灾害与风险的地方性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生态环境决定着整个村落未来的发展方向。兴安村的村落选址主要包括对周围环境的选择,涵盖山脉、河流以及道路,形成了“依山而建”“绕山环水”以及“临近古道”的基本格局。

首先,兴安村依山而建,符合“觅龙”的基本要求。村落迎坡而建,下辖8个小组,分别为枫香坪、王家界、巴塘(大屋)、瓦场、茶岔溪、中寨、下寨、岩科,皆以山脉为中心,呈向心状分布。从历史来看,早在200万年~250万年前,鄂西南这片土地就有了远古人类的活动,先民以采集狩猎为主,土家族先民以虎为图腾,这些具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历史文化在当地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体现出来,也反映了对自然的原始崇拜。对于风水而言,山脉就是龙,是虎。龙虎交融,反映了中原的龙文化与地方的虎文化的汇聚融合,龙虎是山地民族崇拜和敬仰的对象。在土家族先民采集狩猎的过程中,地形地貌作为生产生活的空间,不仅在物质方面给当地人生计保障,也在精神方面为当地人信仰赋能。

其次,兴安村四面环山,临近活水,符合“察砂”“观水”的基本要求。兴安村四周环山,临近酉水。村内有发源于瓦场阎王洞的喳喳溪河,流经大堰河、喳喳溪,自南向东汇入山脚下的捏车坪河。地处山

之巔的王家界溪流建有水库,以保障村内四季用水均衡。枫香坪组的大洞出水,四季长流,保障了枫香坪村民的生产生活用水。多余水量从紫阳宫的山崖倾泻,汇入关山河。若从村落海拔 800 多米的最高山顶向下俯瞰,远处山峰连绵,八面山危岩耸立,乌龙山云雾环绕,西水峡谷变幻莫测。按照风水学的解释,兴安村四周山脉象征着前后左右四个方位的神兽,具备传统建筑文化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环抱之势,而临近西水则具有聚敛财富、收录福气之意。^[9]

再者,兴安村临近古道,符合“察砂”的基本要求。兴安村处于交通扼要,重庆、湖南、湖北交界之地,属于交通要冲。兴安村内外便民小道纵横交错,交通便利。比较有名的是中路,路口建了大喇宫,自沅江的西水航道止于百福司镇,此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南的重要道路。陆路驿道始建于明末清初,由总铺(今翔凤镇)向南,经红岩铺、上寨铺、漫水铺,达于卯洞铺。雍正十三年(1735 年)改土归流后,来凤至重庆酉阳老寨路、百福司至龙山桂塘坝路建成,兴安村地处这两条路的交界。现代交通沿袭了古驿道的走向,成了通向湖南龙山县、重庆酉阳县以及湖北百福司镇的重要路径。交通便利是村落发展的重要条件,决定了村落商品交换与流通的速率,而商品贸易的发展对交通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交通便利程度将会影响村落未来的发展。

(二)适应环境的住宅营造

兴安村传统建筑营造符合《阳宅十书》对理想住宅的描述,即“左青龙(流水)、右白虎(道路)、前朱雀(池塘)、后玄武(丘陵)”,体现了对自然的适应性和顺应性。从住宅样式与营造方式来看,当地以依势而建的半干栏式吊脚楼为主。吊脚楼作为西南民居建筑的代表性建筑,多依山靠河,为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的生活居住场所。吊脚楼与一般的干栏式建筑不同,不完全悬空,因此也被称为半干栏式建筑。兴安村现有 8 个村寨,62 栋吊脚楼散布在其间,其中最具特色、保存较好的是喳喳溪吊脚楼群。整个吊脚楼群依山势而建,呈现阶梯型叠加的布局特点。喳喳溪吊脚楼群整体沿着青石台阶规律分布,与当地山势地形、植被绿化、小溪绕流浑然一体,形成了自然的采光通风长廊,楼群主道与通达入户的小径自然连接,出行便利。

从民居住宅的地形地势来看,兴安村背靠青山,视野开阔,远眺有群山环绕,临近有西水长流,是理想的住宅选址。首先,背依青山,象征着财富和资

源。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柴火是生火、做饭和烧水不可缺少的资源。背靠青山更利于村民收集薪柴,以满足日常生活的能量供应。其次,群山环抱,有利于抵御外族和寒风。此地位于三省交界之处,多民族杂居,自明清以来常有冲突发生。群山环抱,形成了村落的天然屏障。再次,临水具有聚集福气之意,能够在生活用水方面解决村民的水源问题。从建筑的形式与类型来看,兴安村吊脚楼依势而建的建筑特征符合当地地形与气候的自然构造。这种布局结构充分适应当地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呈现出阶梯形营造建制,一是通过阶梯形的群落布局来增加吊脚楼本身的采光性与通风性,二则利用阶梯形制的坡度高差来应对亚热带季风性气候“雨热同期”的影响,以实现建筑群排水的通畅性。此外,当地“坐北而朝南”的吊脚楼方位选择,迎合了亚热带湿润季风“夏季炎热、冬季寒冷”的特性,通过合理安排房屋的位置与朝向来实现对屋内干冷暖湿的均衡调节。

从民居住宅的土壤环境来看,兴安村地基的选择符合营造的一般性规律。在房屋动工之前,需要进行地基的勘测工作,以确保房屋住宅的稳定性。兴安村的地基勘测符合中国古代的辨土法。所谓“辨土法”,是指在夯实地基之前,进行土壤合适性的检测,根据土壤的固相、液相和气相来选择地基位置。《相宅经纂》卷三记载了“阳基辨土法”,即“于基址中掘地,周围阔一尺二寸,深亦如之,将原土筛细,复还坑内。以平满为度,不可按实。过一夜,次早起看,若气旺,则土拱起;气衰,则凹而凶。”从现代科学的视角来看,住宅勘测的辨土法,土壤的固相、液相和气相对应着颗粒、水 and 气,不同土壤的三相组成不一,因而在土壤的轻重、松密、干湿、软硬等一系列物理性质和状态上有不同的反映,这些物理性质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力学性质和工程特性。^[10]兴安村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土壤以亚热带喀斯特砂质页岩风化为主,砂土与黏土比例含量高,其承载性、透气性、渗水性好,房屋住宅多选择石质砂土作为地基层,通过勘测土壤固相、液相、气相,以实现地基的稳固性与实用性。

从民居住宅的气候条件来看,兴安村建筑营造时节和材料的选择符合营造的适宜性。当地人在房屋动工之前,会选择合适的季节和日期,以避免天气条件的影响。比如:在房屋建造之前,人们会考虑到当地气候条件,将平整地基的工作推延至春季。一方面,相对于夏季而言,春季雨水较多,但冲刷力较小,不会发生由雨水过多而破坏原有地基的现象。

另一方面,铲平地基之后,地基土壤较为松散,合适的雨水能够帮助土壤自然沉降,利于后续房屋建筑工作的开展。从建筑的材料来看,兴安村的房屋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阴阳平衡”。房屋住宅的材料选择非常有讲究,多以木材为主、石材为辅,其中木材主要用于建造房屋结构,而石材多用于夯实房屋地基。建造房屋的材料具有阴阳之分,根据材料本身的导热性,分为阳性建材和阴性建材。阳性建材主要包括木材、泥砖、红砖等导热性低的建材,而阴性建材主要包括金属、玻璃、石材、水泥等导热性佳的建材。^[11]选择木材作为房屋的材料,主要是考虑到阳性材料构造的房屋不易受到外在温度变化的影响,具有更好恒定室内温度的功效。而选择石料材质作为地基材料,则是考虑到石头本身的散热功能。兴安村夏季炎热,石料的散热特性能够使得屋外的炎热空气很快得到吸收和传导,以实现降温的功效。

三、制衡自然:来凤县兴安村建筑仪式的均衡之理

建筑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单元,承载着许多的仪式与功能。兴安村作为传统村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村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制衡自然生态环境的地方知识,并通过营造仪式的空间性、物质性以及文化性来实现与自然的对话,建筑文化具有地方性、区域性以及民族性的特征。仪式与场所的交互性,反过来促进了当地的生产生活实践。兴安村建筑仪式具有功能性的一面。人类学家布尔迪厄曾阐述道,“文化来源于生产生活实践,亦作用于生产生活。仪式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民居建筑的‘场域’中展现出来,一方面受制于‘场域’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处于社会网络空间的人们,并参与到物质与精神生活之中。”^[12]兴安村村民以传统建筑营造空间为中心,衍生出一套符合民族和地域文化特性的仪式呈现方式,表现在建筑营造过程的仪式呈现以及建筑作为场所的仪式呈现两个方面,并被赋予了实践性的功能表达,以满足当地人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求。

(一)营造仪式的神圣性表达

当地的建筑营造仪式包含卜宅、择吉日和上梁等关键过程。这些仪式体现了人们对于民居住宅的美好期望和对制衡自然的向往。一方面,建筑仪式通过象征性表达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建筑仪式通过功能性呈现满足了基本的生产

和生活需求。这种仪式性的活动不仅是文化表达,更是社会与环境互动的重要方式,既传达了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又促进了实际建筑有序进行。

卜宅是指在房屋建造之前进行的一系列勘测风水和选址朝向的仪式活动。专业风水师通过这一仪式,凭借其丰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为建筑环境提供功能性的指导,以帮助村民在适宜的位置建造符合需要的房屋,确保房屋的外部 and 内部结构在功能上达到均衡。在兴安村,卜宅仪式开始前需要请当地知名的专业风水师“看风水”,即勘察地势定位,以确定吉宅的位置和朝向。通常,这些风水师由当地的“端公”(从事迷信活动的人,一般为男性,主要从事捉鬼活动)和“土老司”(又称梯玛,从事祭神驱鬼巫术的人)担任。通常在主人确定大致的方位后,风水师使用罗盘等工具,按照“宅以形势为骨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为衣服,以门户为衬带,若得如是是俨雅,乃为上吉”的原则,选定地基。在测定房屋方位时,一般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为选宅基的基本条件,即坐北朝南或坐西向东,背风向阳,交通便利,环境优美。选定地基后,会插上竹竿或树枝作为标识。^[13]

择吉日是指在房屋动工之前,谨慎选择适宜的季节和日期,以规避气候和天气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这一仪式的目的在于避免自然因素可能引发的“文化诅咒”,这些诅咒通常以间接方式影响村民建筑空间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民居建筑的形成、仪式的举行,以及与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各个方面。在选择季节时,当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悠久的传统,尤其是在房屋建造的初步阶段,即平地基建阶段。鉴于当地气候条件,村民通常倾向于春季,因为春季雨水较多,冲刷力较小,有利于地基的自然沉降。^[14]此外,选择日期显得至关重要。在建房破土之际,村民会请风水先生看日子,选择黄道吉日,以避免冲犯太岁,即在“太岁头上动土”,引发不祥。通常而言,更倾向于选择双日,忌讳单日。仪式性选择有助于确保动工过程在吉利的氛围中进行,预防可能的负面影响。

上梁是指在建筑主体结构完工后进行的祭祀文化活动,旨在祈求上天的庇佑。传统土家族的上梁仪式以修建房屋的堂屋为核心,由专职的仪式人员引导,通过仪式性的自然沟通,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个过程突显了人与自然神的对话,通过文化演绎方式满足房屋功能的尽善之需。在上梁仪式中,梁木的选择是一个严格遵循仪式的过程。主梁

木材不得取自房主家庭的后山,因此需要请风水师在他人树林中搜寻,并在半夜秘密采集。在砍伐前进行祭祀仪式,点燃三炷清香并焚烧纸钱以祭祀树神。梁木在砍伐时需倒向东方,以寻求吉祥。下山时,使用红布带系扛梁木,表示其为“偷”得,即便树主遇到,也不会责问。整个过程融合了祭祀、风水和传统信仰的元素。^[15]上梁仪式开始后,进行祭祀,点燃香火,祈求神仙庇佑。然后,掌墨师和贺梁官相互吟唱“上梁礼词”,祈愿平安吉祥。随后,扇架搭建完成,开始上屋梁。掌墨师和大徒弟分别站在屋梁两端,念过咒语后削下一块木屑,由房主用衣尾装载,然后用红布包裹并藏于梁木中。在此过程中,站在扇架上的人将吊梁木的绳子投下,木工师傅唱“赞屋歌”,然后用绳子将梁木安置在中堂两侧扇架的中柱上。掌墨师师徒俩攀梯至梁头,为主人祝福。随后,开始抛洒梁粑粑,伴随赞屋歌声,众人争抢,鞭炮声齐鸣,唢呐奏响,场面热烈喜庆。^[16]

(二)场所仪式的世俗性表达

传统建筑作为村庄的文化场所,成了见证仪式过程的重要空间单元。所谓“仪式”,通常被界定为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象征性的表演性的行为方式。^[17]兴安村村民将生产生活实践方式通过建筑空间展示出来,对其自然生态观念进行抽象化的处理,并通过一系列的象征仪式符号和行为呈现出来。一方面,通过场所仪式的文化赋予,将其对待自然的神圣性态度 and 对待生活的世俗性态度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人们制衡自然的重要文化手段。另一方面,通过仪式化处理,将自然观念以文化传承的方式延续,利于代际传承和知识创造。

岁时节日,一年中依据岁、时、节等某种时序周期循环的时间观念,举办例行性的仪式活动。兴安村村民有过“社”“四月八”“端午”“月半”“赶年”等节日习俗。每逢岁令佳节,当地有焚香烧纸、祭拜先祖的仪式。整个仪式主要以堂屋、土地堂、庙宇为空间中心,村民需要准备美酒美食与香蜡纸烛,通过叩拜与作揖的形式来表达对先祖、神灵的崇敬之情。“过赶年”具有代表性。相传在明代,东南沿海战乱,倭寇侵扰,皇帝命令土家众土司率土兵前往抗倭。年关将近,将士们要在除夕前出发,因此决定提前一天过年。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行动,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整个“赶年”仪式比较复杂,突出表现为仪式在不同空间的转换。在墓园举行上坟祭拜,在神龛前祭祀先祖,在土地庙祭祀土地神,在水井边祭祀水神,在灶屋祭祀灶神等。吃年夜饭之前,在堂屋

的神龛前举行家族的祭祀仪式,以求家族兴旺。准备食物和香烛在土地庙祭拜,以期来年风调雨顺等。围绕村落空间和建筑空间展开的兴安村节日祭祀活动,反映了当地人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道教、佛教文化的交融,血缘与地缘的混合。村落节日文化的精神力量维系着村里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促进村庄的团结和社会和谐。^[18]“过赶年”时,村民会在村庄的公共建筑摆手堂或村里的公共广场举行跳摆手舞仪式,烘托节日气氛,增强村庄的凝聚力。随着现代性增强,摆手舞仪式也被用于迎宾或与村庄外的交往。仪式空间会根据具体情况在村落不同建筑间转换,村口、村中道路和旅游景点均有可能进入仪式空间。

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人生过程会有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这些节点一般都会举行庄严的仪式。这些人生礼仪一般围绕建筑空间进行。每逢出生、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时,村民会以堂屋为中心,举行一系列的仪式,来实现人生阶段的转变。当地以干栏式建筑为主,正屋多为“三开间”“五开间”。一般情况下,堂屋位于正屋正中的一间,是举行人生仪式的重要场所。正屋的大门开在堂屋,堂屋正对大门的一方设有神龛,神龛上有“天地国亲师”位,左右两边分别写着“×氏堂上历代祖先,九天司命太乙府君”。神龛下方设有木制香案,用以摆放香炉、酒杯以及祭祀用品等。有些村民家里没有设置神龛位,而是用毛主席像替之。^[19]堂屋作为仪式的中心,成了仪式呈现的重要舞台。每当遇到人生大事,村民便会请来当地的三棒鼓艺术表演者。一般四人为一队,一人主演,其前置放一小圆鼓,边抛棒边打鼓边唱;另外三人,一人敲马锣,一人抛刀(刀为三至五把),一人耍“连绞棒”,此为花鼓演唱的基本形式。唱词每板四句,多为“五五七五”句式,四句均押韵,每板唱完后可换韵,间歇均用锣鼓,唱腔随地方声调的不同而变化。有时候,三棒鼓表演也会在建筑围成的院坝或建筑附属的广场举行。

面临疾病、天灾,触犯禁忌时,村民也会举行相关仪式消除这些非常态。仪式的举行和禁忌的遵守都会与传统建筑发生联系,与神灵和祖先沟通,一般会涉及堂屋、神龛和一些公共建筑,如土地庙、飞山庙等,也有可能涉及祖坟等阴宅。兴安村人在经历各种超自然力量所致的关口、劫难时,往往会结合当地的地方知识和仪式来治疗,以实现回归良好状态的目的。一般会有两种情形需要举行过关仪式,一是婴儿出生后经八字先生测算犯有关煞,需要“过

煞”；二是幼童多次遭遇突如其来的意外伤害、不明征兆的病痛，或经西医、中医治疗却久治不愈。仪式过程以堂屋为中心，包括请神上香、执符念咒和断卦、过关解煞等环节。请神上香由梯玛焚香念词，请求各路神仙降临，以保佑小孩去除病灾，早日康复。梯玛唱完唱词，然后占卦，依卦象来判定请神是否成功。若成，则进入下个阶段；若未成，则继续焚香跪请，一直到卦象显灵为止。梯玛低声念咒，并用公鸡鸡冠血祭神，开始打卦，向诸神询问断卦的时机。只有卦象显示圣卦，才可断卦，否则，要继续念咒、打卦，直到打出圣卦为止。随后进行断卦。断卦是通过刀卦的卦象判定治疗对象所犯关煞能否被治愈，小孩能否养大成人。刀卦由司刀、宝剑、五根筷子、惊堂木构成。司刀由八枚铜钱串成的圆形铁环组成。梯玛将司刀、宝剑、五根筷子、惊堂木抛出，它们落地时呈现的形状即为刀卦卦象。梯玛仔细观察并解读卦象，并同助手低声交流，随后进入过关解煞阶段。过关解煞是过关仪式的核心环节，仪式过程包括重新布坛，梯玛卜卦，梯玛助手携公鸡度关，梯玛助手抱小孩度关，拆关桥。^[20]

四、结语

顺应与制衡是一对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自然策略，表达了人们对待自然的一种定向性情感，通过精神层面的内驱力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两种策略在功能层面上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表现为以近似的频率作用于人们改造和顺应自然的实践，并形成了一致性的结果。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这两种策略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论。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创造地方知识的方式来探索自然生态的发展趋势，以求一套适应于族群生产生活的理论方法，这是遵循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体现。另一方面，人类在遵循自然生态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通过地方知识和普遍经验指导实践的方式来改造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顺应侧重于遵循自然的方面，呈现村民的乐观、豁达和超然；而制衡则侧重于改造自然的方面，呈现村民的积极进取和科学探索，两者共同构成了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自然观念。

作为传统的自然策略，顺应与制衡是人们遵循自然、改造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自然环境、人居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整个实践过程，成了人们应对自然的观念性法宝。来凤县兴安村村民依靠

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发展了具有顺应自然、制衡自然特征的建筑观，并通过宏观的村落选址、微观的民居营造以及象征性的文化仪式呈现出来。作为武陵山区传统村落的代表，其建筑空间的自然策略对于探索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地人对待村落生态环境的依偎式建筑空间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是人们遵循规律、顺应自然的结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三农”问题提到新的高度，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强调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全面振兴。要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宜居，需要遵循当地地形地势、气候条件以及土壤植被的客观规律，实现人居环境的和谐共生。兴安村村民通过建筑仪式的呈现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自然的情感态度，这是人们师法自然、制衡自然的文化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21]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同时，需要促进文化的振兴。只有将自然空间与文化空间相互衔接，才能在整体上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1]胡咏君,吴剑,胡瑞山.生态文明建设“两山”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J].中国工程科学,2019(5).

[2]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情报资料研究所.常用农业科技词汇[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3]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科教兴滇涌俊才·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02 年~2006 年科研成果集(上)[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4]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5]朱熹.朱子全书(第 16 册)[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6]王韬.主体认知视角下乡村聚落营建的策略与方法[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

[7]佟士枢.对立与共存——武陵山区乡土建筑形制再探[J].城市建筑,2017(23).

[8]区锦联.生态人类学视域下传统知识的价值研究——基于鄂西来凤县兴安村的田野调查[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3).

[9]王新武,孙犁.建筑工程概论[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

[10]程建军.风水解析[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

[11]沈在红.风水学习百科[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9.

[12]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13]彭英明.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14]张爱武,谭梅,刘宇.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的田野考察——以兴安村为例[J].寻根,2013(4).

[15]金述富,彭荣德.土家族仪式歌漫谈[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

版社,1989.

[16]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筑特色研究·村寨建筑文化研究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17]张晓萍,李伟.旅游人类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18]向轼.卯洞土家族春节祭祀活动及其文化内涵[J].民族艺术研究,2010(3).

[19]林继富.酉水流域土家族民俗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20]罗钰坊.仪式疗法:土家族过关仪式的医学人类学阐释——以鄂西兴安村为个案[J].贵州民族研究,2018(1).

[2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014/c1024-27698729.html>.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Adaptation and Balance: Nature Strategy in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Ethnic Villages in Wuling Mountains: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Xing'an Village in Laifeng County

Quan Xiang¹ Gong Zhixiang^{1,2}

(1.School of Ethnolo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19;

2.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Laifeng County Committee, Laifeng Hubei 445700)

Abstract: Adaptation and balance are two distinct nature strategie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through long-term ecological practices. These strategies mutually influence and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shaping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through internal spiritual motivations. Initially, adaptation represents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perceiv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during early human historical evolution; it is adaptable but passive. On the other hand, balance signifies a positive feedback attitude used to transform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fter human society enters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t is creative and proactive. As a multi-ethnic settlement, the ancestors of Wuling Mountains have inherited this bidirectional ecological concept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applied it to their architectural culture within ethnic villages. This concept is manifested through macro site selection, micro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as well as site ceremonies conducted within these villages. Such 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can assist us in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within our society with a more balanced approach. It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dur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Wuling Mountains; architectural construction; natural strategy